

# 沽源南沟村元墓与阔里吉思考

周良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市 100006)

关键词: 沽源南沟村 元墓 残碑 阔里吉思

KEY WORDS: Nangou village in Guyuan county Yuan tomb Broken stele Korguz

**ABSTRACT:** There is a person called Korguz who is mentioned in the History of Yuan. The Mongolian elite tomb at the Shuzhuangliu site in Guyuan county has yielded a broken stele on which a name called 'Xiang Korguz' (襄阔里吉思) was carved. This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occupant should be the one who was conferred the title of King of Jinning (晋宁) and granted the posthumous title of Zhongxiang (忠襄) by Emperor Huizong of Yuan, and was buried in Luanjing. This person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other Korguz who was the chief of öngüid tribe during the early Yuan Dynasty and the son-in-law of Kublai Khan, and was bestowed the title of King of Tang (唐) and offered the posthumous title of Zhongxian (忠献). In addition, the tomb occupant should not be the same person who was also called Korguz but belonged to Alchidai tribe according to the volume 134 of the History of Yuan. Thus, we should abjure on the groundless point mentioned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Mughal (Mengwuer Shiji 蒙兀儿史记) by Tu Ji (屠寄) that these two Korguz were the identical person.

2002 年,河北省文研所对沽源县南沟村俗传之辽萧太后梳妆楼进行了发掘,在祭堂内发现了一男二女的蒙古贵族墓葬,居中的男尸采用树棺葬。树棺葬的首次发现与《元史·礼乐志》等史籍所记完全相合,是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墓葬已经过极严重的破坏,随葬品几乎全数盗失。除了一件已多处腐烂的丝织长袍和偶存的二龙戏珠鎏金银带钩可供推定这是一位高位的蒙古贵族外,再没有其它器物可资考证。唯在堂外坍塌堆积物里,找到了小块石碑的破片。破片上尚残留有“襄阔里吉思”和“敕撰 翰”(另行)、“臣为”(另行)几个字。考古人员根据这三行的几个字,推测这位墓主人阔里吉思可能就是《元史》(卷 118)所载著名的汪古部首领、忽必烈的外孙、驸马、封高唐王、当时驰名中外的阔里吉思。这个说法在 2003 年《中国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的赵琦《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主考》一文提出过异议。这篇文章论证内容或尚欠充分,结论应认为是正确的,但根本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多年来,这个完全缺乏可信根据的推断几乎成了考古界的定论,在电视

上、网络上、新闻媒体与旅游广告上沸沸扬扬,广泛流传,造成很大影响。如果它真是汪古部墓地和阔里吉思王墓葬,无疑是海内外治中西交通史、宗教史、民族史者所企望多年的大事,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和严肃对待。

大家都知道,“阔里吉思”是基督教徒通行的名字乔治 George 在元朝时候流行的汉译。有的地方也写作“阔儿吉思”。元代阴山地区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十分流行;大都(今北京)地区罗马天主教也一度兴盛。因此,教徒中,无论贵族或平民,以阔里吉思命名的肯定不在少数。《元史》里为立传的就两个,另外散见在史传、文集里的不下六、七个。究竟这位“襄阔里吉思”是哪一位?“襄”字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只能就所发现的残碑这件唯一的文物来进行研究。这块破片明显的是大碑右侧最边缘的小块裂片。照片清楚地显示大碑右边的棱线和一部分右侧的平面。这就为我们无可怀疑地表明:

……“襄阔里吉思”……正是碑文的首行。

……“敕撰 翰”……是全碑的第二行。

……“臣为”……依次是碑文的第三行。

揆之通例,不难看出第一行是碑文题目,第二行是碑文作者的署名,第三则是正文。第二行“敕撰”上面,脱损的必当是作者的官称、姓名,然后是(奉)敕撰;“翰”字下必当有“林”和官职及篆额或书丹的某人姓名。这是一块典型的神道碑,是奉皇帝的旨令由词臣撰写的。这样,由前面第一行的题目我们就可以按成例大致推定全文是墓主的一系列官称,所赠散官勋爵谥号再加某公神道碑铭字样这样一个惯行格式。按照这个格式,“襄阔里吉思”的“襄”就可以怀疑是死者阔里吉思的谥号,或者是谥号的末一个字。这就至少为我们在茫无头绪中看到了一丝可资探索的线索。

我曾当面请教发掘的负责人:此处的“襄”字应作如何解释?回答是“襄助”、“帮助”。从通行的语义讲,这是不错的,意即帮助阔里吉思。不过,如果像我上文所推定的,这是一块敕撰的神道碑,碑文的标题中绝不会有如所认为的“帮助”之义的语句和语义。即令在正文里,阔里吉思的神道碑里竟出现“襄(助)阔里吉思”这样的句子,也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直书墓主的名讳,于理,这是大不敬的事。因此,把“襄阔里吉思”解读为“帮助阔里吉思”是浅碍难通的。

作为汪古部长、忽必烈的外孙、成宗驸马的阔里吉思神道碑有二通。一为闫复撰《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收录在《元文类》第23卷;次为稍后刘敏中撰《赵王先德加封碑》,收录在《中庵集》里。《元史》卷118《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附《阔里吉思传》就是根据上述两个材料写成的。他的谥号是“高唐忠献王”,至大二年加封赵王,谥仍“忠献”。他显然与谥号有“襄”字者各不相干,肯定不是同一个人。此外,还有另一条重要的证据:汪古部的属地在阴山以北,在金代,它是受命拒守阴山长城厄口的。阎碑称“亡金堑山为界,以限南北,忠武王(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长,阔里吉思的曾祖父)一军厄其冲。”这里所说的冲要,就是金界壕所述“净州之北,出天山界外”,今内蒙四子王旗一带突出在大青山以北的边界要冲。刘碑记载这位部长阔里吉思归葬在汪古部的先茔地也里可儿思。这个地方的确切

方位至今我们仍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其地离王府的所在地德宁(今内蒙百灵庙东北百余里艾不盖河西岸鄂伦苏木古城)颇远,很可能在净州(今内蒙四子王旗界外),但绝不可能远到张北的沽源地区。沽源地区在金代属于桓州、抚州、昌州所辖。《金史·地理志》桓州,治所在今正蓝旗。抚州,是桓州的支郡,治所在柔远(今张北)。昌州,先隶桓州,后以狗冻复置,隶抚州。今天的宝昌,沽源县就是昌州所辖。金朝的边界原来在桓州近地,后来为了加强防御,修建界壕,向外拓展了百十余里。元张德辉《岭北纪行》记“昌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驿入沙陀。”金人杨奂《抚州诗》:“北界连南界,昌州又抚州。月明鱼泊夜,香冷鼠山秋。”鱼泊当即狗泊。昌州是金北界的边郡,界壕更在郡治北面百十余里。汪古部的领地在阴山之北,先茔之地也只能在金源界外,决不可能在沽源地区,这是可以肯定的。从以上两点证据,即一、谥号不同;二、葬地各异。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定沽源梳妆楼所发现的阔里吉思便是汪古部首领的阔里吉思其人。

细检《元史》,卷38《顺帝纪》后至元六年正月戊寅“追封阔儿吉思宣诚戡难翊运致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晋宁王,谥忠襄。”这位名阔里吉思的贵族大臣,被追封二字王,当然有让皇帝敕令词臣为他撰写神道碑的资格,谥号为“忠襄”。与残碑的“襄阔里吉思”吻合,这就证明他们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此其一。证据之二:元末大文人许有壬的《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34)一文里,说“晋宁忠襄王有功三朝,皇上闵劳,敕词臣铭其碑。子中书平章政事王家奴以碑在滦京墓道,后虽永传,四方或不知。移刻诸梓为方册,庸便流布,征序号其端。”可知这位忠襄阔里吉思的葬地是滦京。今天的沽源县梳妆楼一带正是在元上京附近。上京滦河(今闪电河),所以元人也称上都为滦京。这就进一步证明,这位葬在梳妆楼的(忠)襄阔儿(里)吉思,与汪古部首领的高唐王、赵王、谥忠献的阔里吉思是不同的两个同名,不容混淆。

我们进一步来考证这位忠襄阔里吉思的平行状。许有壬短序中概括地作了描述：“王之先世典环卫，笃忠荃。至王以沉毅详审，为武王亲臣。继事明皇于雷雨盈满之际，盘桓屯难，草行露宿，以继艰贞。佐皇上于乾坤清爽之时，不危不溢。宜享寿考，而年才五十五，未尽其报，岂天将遗其子孙以未艾之福乎！”据此，滦京墓道的神道碑虽然受到粉碎性的击毁，仅存下几个字的残片，但是我们从《元史·宁宗纪》、《顺帝纪》中的某些片段，与许序所描述的相互印证，他的身世仍然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这位阔里吉思出身在一个蒙古贵族世家，累代充宫廷护卫（怯薛），他本人就是以怯薛而成为武宗海山的亲臣。在元代，累朝皇帝和亲王人等各有个人的怯薛。这种人与他们的护卫主人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从属关系，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是主人的亲信私人。

1312年，武宗死，按照他兄弟间兄终弟继的成约，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但仁宗蓄意毁约传子，于是出封武宗长子和世璜为周王出镇云南。和世璜在之国途中，由武宗旧部的拥戴，西走金山（阿尔泰山），自成一部。十一年之后，经历了英宗与泰定帝两朝，武宗的次子图帖木儿重新取得了皇位，是为文宗。文宗因为自己是庶出，所以尽管已正式称帝，仍遣使远迎和世璜回朝，“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和世璜便兴致冲冲地间关万里、风餐露宿、兼程东归。1239年二月在和林正式即位，是为明宗。四月，在间关颠沛中明宗匆匆任命了自己的中书、枢密大臣，阔里吉思被任命为中书右丞。当在大都的右丞相铁木儿补化以灾旱请于皇太子（即文宗图帖木儿）并请辞去相位时，皇太子遣使来报。明宗谕阔里吉思等曰：“修德应天，乃君臣当为之事。铁木儿补化所言良是。天明可畏，朕未尝斯须忘于怀也。皇太子来会，当与共图其可以泽民利物者行之。卿等其以朕意谕群臣”。（天历二年六月）许有壬文章的“事明皇于雷雨盈满之际，盘桓屯难，草行露宿”，正是这一段万里流亡和仆仆东归的真实写照。我们完全可以推想，作为武宗亲信的阔里吉思，原是和世璜西走金山的忠实追随者，因此才有了当旅次艰难，新皇初立时的中书左丞任命。

七月，和世璜抵中都，就被毒害。文宗重新即位。他对随和世璜东归的从者采取了优容的态度，阔里吉思改任了宣政院使，实际的权利却被剥夺。

1332年，文宗死，皇位又戏剧性地回到了和世璜的庶长子妥懽贴睦尔手里，是为顺帝。当时，顺帝还在被出放的广西静江。派出迎接他回朝的使者就是重任中书右丞的阔里吉思。从此，这位武宗的旧部就开始大红大紫起来。由平章而晋知枢密事。后至元元年九月，封宜国公，十二月，加银青光禄大夫，兼左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他的权势，甚至可以同当时最大的权臣伯颜相颉抗（参考《辍耕录》）卷15《高丽氏守节》）。但是好景不常，他大概就在这几年后死去，于是而有后至元六年正月追封晋宁王，谥忠襄之诏。以年寿五十五岁推算，他的生年大概是1283年（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左右。他无疑是一个景教徒。儿子王家奴，也作汪家奴。番音重，故读王为汪。王家奴在后至元五年顺帝罢黜权臣伯颜的一次政变中是参与密议的几个核心人物之一。以后一路高升，后至元六年，由枢密同知晋平章，寻改知枢密院、御史大夫。至正十五年为中书右丞相。二十七年，追封宪王。谥忠靖。他的儿子桑哥失里也官至中书添设右丞，同知经筵事（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可知这个晋宁忠襄王阔里吉思祖孙三代在顺帝朝都是权势颇重的重臣。王家奴官至右丞相。根据元朝的惯例，中书右丞相原则上只能由蒙古族人担任，可证他出身蒙古族，至于是蒙古的哪一部，则无法推定了。

这里，我们还要顺便来理清一桩久已扑朔迷离的公案。在《元史》里有传的两个阔里吉思，即除卷118汪古部长阔里吉思之外，还有卷134的按赤歹部阔里吉思。这个按赤歹部阔里吉思与我们上述的梳妆楼墓主人阔里吉思有没有关系？更确切地说，他俩是不是一个人？据《元史》，按赤歹部阔里吉思的出身、仕履，本传里叙述很清楚。他曾祖以来，世有战功，他曾充世祖忽必烈的怯薛，担任主饮食的博儿赤。至元二十五年出任湖广行省平章，讨平海南黎族的反抗。成宗铁穆耳大德二年，改福建省平章，寻升征东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五年，复拜湖广平章。明

年,改陕西。武宗海山至大四年,时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已即位,中书奏任他为甘肃平章,监察御史弹劾他前任时受重赃,乞行罢黜,照准。他大概也就在这之后死去。他一生的情况,是清清楚楚的。

上世纪初我国的元史、蒙古史大家屠寄著有《蒙兀儿史记》一书,卷105有燕只吉台(即按赤歹之异译)氏阔里吉思传,其基本材料就是用《元史》本传敷衍而成,只是细节方面,又摄取《元史》本纪中的记载,有所丰富,但很明显,他并没有发现更多的新材料。奇怪的是屠寄在本传的后面,竟改卒年六十六为六十一,添加了“追封晋宁王”。儿子也由《元史》本传的一名完泽外增加了汪家奴为二人。有关汪家奴及其子桑哥失里的仕履与我们上面据《元史·顺帝纪》所作的摘述大体全同,但也小有增补(如其卒年为至正十三年)。照屠寄的这一说法,《元史》(卷134)的按赤歹部阔里吉思不正就是我们所要求证的梳妆楼残碑的“襄阔里吉思”吗?真是莫明奇妙!

我们无法知道屠寄这样做是不是掌握有其他的确证。但是就现在仍存的唯一证据许有壬的短序来看,屠寄把汪家奴作为附传加在《元史》的按赤歹部阔里吉思传之后,说成是他的儿子,是完全说不通的。许序有关忠襄阔里吉思的身世有力地说明,他与按赤歹阔里吉思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前者是元朝后期武宗海山、明宗和世璠、顺帝妥懽贴睦尔三朝中枢的心腹大臣,如果他在武宗时充怯薛,“典环卫”之先,还有行省湖广和高丽的这样重要经历,为什么许序丝毫不曾提及。后者是元朝前期忽必烈和成宗铁穆

耳、武宗海山的行省大吏,如果他以后还在宁宗与顺帝时期又升任中书平章和知枢密院事这样更高级的中央官职,为什么《元史》本传中却一字不提。这都有力地证明,屠寄把《元史》按赤歹阔里吉思牵强编造,以致与梳妆楼墓主人忠襄阔里吉思合为一个人,是完全没有根据、不符真相的。应该说,屠寄补修《元史》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在《蒙兀儿史记》中所增补的资料,凡涉域外的,可取处只能算仅十之二三。这是由于语言限制,当时很难求全于个人。至于所增补的汉文资料,则十之八九是有价值、值得肯定的。因此,上述的错误,虽难免荒谬之讥,然小眚不掩大德,我们不当求全于前人。

末了,我想就梳妆楼蒙古贵族墓遭到如此严重破坏的原因提供一点参考材料。在《明史》(卷152)王英传里,记载王英永乐二十年侍从成祖北征。“师旋,过李陵城,帝闻城中有石碑,召英往视。既至,不识碑所。而城北门有石出土尺余。发之,乃元时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也。碑阴则刻达鲁花赤等名氏。具以奏。帝曰:‘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起争端。’命再往击碎之,沉诸河,还奏。”这样的事,当时多有发生是肯定的,并且还把地方的蒙古名字并加改称为汉名。梳妆楼的发掘者对这里墓室的破坏凿字碎碑,感到惊讶,认为超出一般盗墓所会干出来的程度。联系永乐的这一指示,可见这确非寻常盗墓而是一种政治性的打击与破坏,就完全不足为奇了。不过这个地面建筑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责任编辑 朱艳玲)